

文史资料存稿精选

⑤ 日伪罪行实录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WENSHI ZILIAO CUNGAO XUANBIAN JINGXUAN

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精 选

⑤

日伪罪行实录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/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伪罪行实录/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 —北京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6. 3

(《文史资料存稿选编》精选)

ISBN 7—5034—1801—X

I. 日… II. 全… III. 日本—侵华—史料
IV. K265.3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4514 号

责任编辑:于保政 封面设计:兆天书装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装: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:102612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19.75 字数:350 千字

印 数:3000 册

版 次: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320.00 元(全 10 卷)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日 伪 罪 行 实 录

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阴谋和蓄意挑衅

当历史翻到 20 世纪这一页,日本这个弹丸岛国再也不安于水中央的生活了,开始向隔海相望的中华巨人频频伸出魔爪:组建以占领中国东北为目的的关东军,扶持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,煽动朝鲜民众反华,甚至抽签决定驻华副领事自杀以嫁祸……件件桩桩,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历历在目,华夏儿女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血泪写就的历史。

天津日租界纪实	刘霁岚等(3)
为侵占中国东北而组建的日本关东军	高丕琨(19)

日本煽动的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暴行

..... 卢广绩(31)

南京藏本失踪事件始末..... 顾缀英(36)

日
伪
政
权

在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中,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击,面对战略物资的极度匮乏,日本人使出了“以华制华”、“以战养战”的毒计,拉拢一小撮中华民族的败类,成立了一个个伪政权,从伪满洲国到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,从伪蒙疆政府到伪华北临时政府,再到汪伪中央……一台台的木偶戏在日占区上演着。

日伪“国旗”怪态	宋淇涵(45)
伪满洲国成立前后	李士英(50)
伪满见闻琐记	韩茂森(64)
我耳闻目睹伪满巨奸丑像	王贤伟(73)
冀东事变鳞爪	王六也(83)
回忆伪蒙疆政府	奇天祥(90)
回忆为虎作倀的新民会.....	郝武(104)
汪伪政治部情报局内幕.....	赵一雪(121)
记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.....	金湛庐(126)

征服一个民族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掠夺她的经济使其贫穷,毒化她的肌体使其羸弱,摧残她的文化乃至母语使其失去信仰。这是日军的信条,也是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的一贯手段。最终,炎黄子孙给了他们响亮的一记耳光,提醒他们“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”。

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·····	库益菴(139)
日军支持下的大规模海洛因制造厂·····	王 龙(144)
奴化教育亲受记·····	张德伟(150)
日军对燕京大学的镇压·····	张宗颖(171)
沦陷时期北平的新闻业·····	王隐菊(179)
沦陷时期日本电影在上海·····	张绍甫(183)

历史是公正的,谁背叛了正义、背叛了民族,谁就应该付出代价、受到惩罚,溥仪、汪精卫、王克敏、周佛海、王揖唐……任谁也不能例外。或许你能得意于一时,甚或你能风光一世,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,你将永远钉在中华民族的耻辱柱上,遗臭万年。

我所知道的王克敏·····	佟忠厚(19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汪精卫叛逃之我闻·····	武和轩(198)
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·····	周之友(204)
王揖唐汉奸案·····	曹增祥(232)

其 他

一个日俘之死引发的闹剧;反“客”为主的日本侨民享有的种种特权;被绑赴日本的中国劳工的悲苦遭遇;一个伪满官员的苏联战俘营经历……把你带进那段凄风冷雨、风云变幻的岁月。

日俘空闲升之死的内幕·····	王云凡(239)
上海沦陷期间日本侨民的特权·····	张绍甫(246)
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惨况·····	韩国骏(269)
在苏联战俘营·····	高丕琨(287)

七七事变前日本侵华阴谋和蓄意挑衅

当历史翻到 20 世纪这一页，日本这个弹丸岛国再也不安于水中央的生活了，开始向隔海相望的中华巨人频频伸出魔爪：组建以占领中国东北为目的的关东军，扶持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，煽动朝鲜民众反华，甚至抽签决定驻华副领事自杀以嫁祸……件件桩桩，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历历在目，华夏儿女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血泪写就的历史。

天津日租界纪实

刘霁岚
马惠卿
胡君素

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开辟了租界，并利用这块基地，进一步对我国进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侵略。几十年中，蓄养汉奸，策动战乱，压榨奴役中国人民，掠夺了大量财富，并恶毒地用鸦片和烈性毒品毒化中国人民，穷凶极恶，罄竹难书。

日租界的组织情况

最初的天津日本租界在法国租界西北，占地 1660 亩，所占海河岸线长达 3600 英尺。迨至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后，各国租界都拥有驻兵权，因而英国和日本乘机在原订租界地外，强行推广。其中，日本推广线东南与法国租界相毗连，南至墙子河，西北至海光寺，东北至海河，北至闸口而达天津县城的东南角，占地面积达 2150 亩。租界内的地皮，各国以租用为名，租界当局只向中国官厅缴纳甚微的象征性地税。尤以日本租界内的地皮，竟被规定产权永远属于日本租界当局，中国人建筑房屋，不但征



天津日租界鸟瞰

收地捐超过它向中国官厅缴纳地税的百倍以上，还规定在日本租界当局需要时，可以随时拆除征用。

1902年，日本外务省公布了日本租界的《日本居留民团法》，成立了居留民团，成为这个区域的自治单位，设立了租界局。居留民团法规定，日本人或日本财团法人，居住日本租界6个月以上，即可加入居留民团，由居留民团选举该团团长和助役。中国人虽居住日本租界多年，也不许参加这个组织。初期，在该租界居住的中国人，凡稍有资产的，每年年终租界局行政委员会举行年会时，为了标榜中日亲善，会邀请几个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人参加听取报告。至于租界内的警察管理权，则完全由日本驻津总领事馆控制。居留民团与警察署是平行机关，都受总领事监督指挥。

租界局为日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。局以下设有捐务课、工程课、电务课和保净课。捐务课负责征收工巡费、房地产捐税等；工程课负责营造、修建马路地沟工程等；电务课负责装设马路照明和公私用电之线路、灯具等；保净课负责管理全租界公私卫生以及防疫等。课长都由日本人充任，兼用几个中国雇员。居留民团设团长一人和助役若干人，居留民团团长等于租界局的行政长官，租界局以居留民团名义，设立于日本花园公会堂左面的福岛街（现多伦道）。最后一任居留民团团长是白井忠造，助役是二宫、野崎。天津沦陷后，白井忠造就以居留民团团长身份，兼任伪天津市政府的日本顾问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军接收天津英租界，改为接管

区，居留民团的助役二宫被任命为接管区的顾问。日本花园公会堂内，有一个神社和“日清战役纪念碑”，神社附近不准行人逗留，日本军民过此，必须脱帽致敬遥拜。中国儿童攀援神社栏杆，被巡捕发觉带走后即处罚家长，因而中国人多绕道而行。

日本租界警察署与总领事馆比邻而居，设在日本花园公会堂右面的宫岛街（现鞍山道），警察署下设保安课、警备课、司法课和特高课。保安课负责管理消防警察、交通警察和请愿警察（负责社会名流私宅警卫）；警备课负责租界警备；司法课负责窃盗案件；特高课负责搜集情报。所有各课的主管称为部长。按日本警察法，课长的官阶，最高只是警部补（日本警察官阶从高到低分为警视——副警视——警部——警部补——部长——巡查）。全租界中国巡捕 400 多人，而充任部长及巡查的日本人，只有 40 多人。中国人称巡查为白帽，因为他们的制服是青色，帽是白色，只相当于中国的警员，但在日本租界作威作福权势很大。日本租界警察署长何久井、司法部长松下兼雄、特高部长樱井，任职时间最长。

日本租界警察署下设 5 个分署：第一分署原设在租界扶桑街（现海拉尔道），1931 年的所谓天津第一次便衣队暴动后，次年日本租界当局在租界边缘仁丹牌坊下，修建碉堡式洋灰铁筋楼房一所，窗户四周均有射击孔，平台上可以架设小钢炮，把第一分署迁移此处；第二分署设在租界淡路街宫岛街转角（现甘肃路鞍山道转角）；第三分署设在租界以外的三义庄，是日本租界警察署以保护住在那里的朝鲜侨民为借口而设立的，该分署设有中国巡捕，由日本巡查直接管理；第四分署设在塘沽，也是日本巡查直接管理，主要是监视上下日本轮船的中国人；第五分署设在东车站，该分署是以保护上下火车的日本侨民为借口而设立的。天津沦陷前，由唐山到山海关，又设立了第六、七、八、九等分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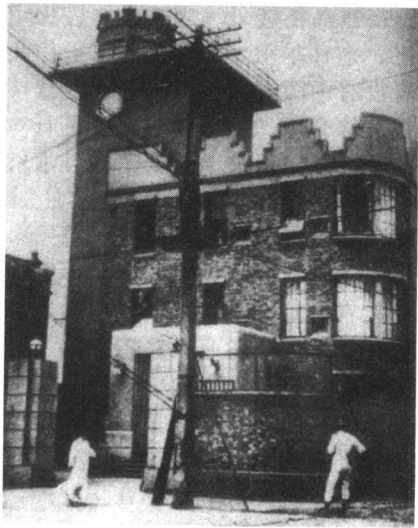
设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总领事馆，管辖日本驻华北各地的领事。总领事以下，设两个领事和副领事多人，分管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；驻屯军派有武官主管军事。总领事调升后，由领事递补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曾在天津担任过总领事的有桑岛、白井、佐藤、加藤、有田八郎、须磨弥次郎、吉田茂、川樾茂、太田。吉田茂是由副领事提升为领事，再升为总领事的，曾任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。有田八郎后升任外务相，也和吉田茂一样，逐步递升上去的。

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在华北地区广设情报网，并利用日本商人搜集各种情况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以及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，无不作详尽、细致的调查研究，甚至具体到河北沧县产的玉米粒大小、重量和含水量，都有详细记录。

政治上的拉拢

日本租界是日本在中国制造战乱的基地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清政府的遗老遗少，除跑到青岛或大连、旅顺外，有些人则居住天津日本租界，例如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住在宫岛街，一般称其居所为张园，当溥仪住张园时，他移住张园后的鸿基里。驻日公使李盛铎住须磨街（现陕西路）德义里2号。四川布政使、张之洞的总文案李葆恂，邮传部尚书陈璧，新疆巡抚袁大化，后来出任财政次长的杨寿楠，都住在花园街（现山东路）。曾任外交总长的曹汝霖住在明石街秋山街转角。曾任驻日本公使的陆宗輿住在寿街（现兴安路）。溥仪的岳父荣源在日租界则拥有大批房产。曾任陕、甘两省巡抚的升允偕同他的顾问工藤铁三郎，也住在日租界，后来工藤因升允关系，随侍溥仪多年，成为心腹。段祺瑞临时执政下台后，租住须磨街魏宗瀚的住宅。复辟策划人胡嗣瑗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与复辟分子商衍瀛、金梁都住在日租界。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罗振玉，于1921年从日本移住天津，住在前门是法租界、后门是日租界秋山街的嘉乐里，他以贩卖金石书画的名义搞卖国求荣的勾当，并受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警察署的保护。这些人中有君主立宪派，有保皇党，也有军阀政客，均是日本当局所要笼络的对象。他们和日本领事们以研究中国古董字画为名，互相勾结利用，把大批中国文物贩运出国。驻日公使李盛铎收藏很多中国古版书，晚年想把藏书出售，胡适曾来李家看过，拟为北京大学购买，以议价4万元不协，被日本人获知，终由南满铁路出资20万元购去日本。

1930年蒋、冯、阎中原大战后，阎锡山兵败下野，11月间偕同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和他的亲信李龙亭，乔装商人潜来天津，初住法租界原天津造币厂监督薄以众（阎锡山的四妹夫）家，后以每月200元的房租，租住日本租界伏见街（现万全道）一所楼房内，不久他的眷属20多人来津，又在



天津日本警察署在租界交界处新建的堡垒式观察哨

日租界秋山街太原里一号租一所楼房，把原设在北平苏州胡同一日本无线电商人家的电台移至那里，同时电召赵戴文、梁巨川和通晓日语的宋澈、靳祥垣、宁绍武等人来津，以人多两处房屋不敷应用，又在明石街熙米饭店包了几间房屋，阴谋东山再起。

阎锡山同土肥原贤二、大仓洋行北平经理林龟喜过从甚密，海光寺驻屯军司令官和日本总领事，同意他架设专用军事电台，薄以众又以6万元在须磨街和浪速街转角，给阎买了一所楼房安置眷属，把伏见街房屋退租。这时军统特务（当时称蓝衣社）在北方大肆活动，阎感觉留居天津难保安全。为阎在日本军部和日本领事馆方面奔走的陈觉生，转达土肥原和日军部主张，要阎去日本居住。阎恐出国后影响他遥为控制的晋军，因而决定暂去大连，但军用电台日本方面不许随其迁移，即将贾景德召来天津，主持其事。是年年底阎偕同赵戴文等乘轮去大连，所留电台收发电文，由阎留亲信护兵6名轮流在大连天津之间递送，密电本由阎自带亲译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，阎锡山由关东军司令部派专机送到大同赵承绶防地，家眷又回到天津日租界。阎锡山重握兵符后，家眷才离津回晋。日本投降后，林龟喜不愿随同日侨遣返回国，由梁上椿陪同跑到山西，托阎锡山庇护，于1947年病死太原。

1928年秋后，因东三省易帜问题，天津日租界当局在土肥原贤二策动下，把曾任张宗昌顾问、黑龙会分子小日向，从大连方面派来天津，联络曾任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的厉大森（青帮大字辈），笼络青帮，在日租界桃山街（现包头道）组织“安青帮普安协会”，由日本宪兵队支持小日向幕后主持，很快发展起来，以《大公报》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和日租界流氓袁文会为中坚分子，张任该会宣传部长，袁任行动部长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华北抗日运动日趋高涨，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日租界组织了一个暗杀机关，此事被上海《申报》驻津记者朱晓芙获知，朱意图敲诈，扬言写成通讯，寄申报揭露此事。暗杀机关的当事人，怕事泄露，答应给朱500元，朱嫌少，正在讨价还价中，朱被人用电刀刺死。朱住日、法租界交界，知其内幕者，都说是日本人所为。

1931年11月，日本政府在天津制造了便衣队扰乱事件，由土肥原指使日本军警配合便衣队，利用袁文会系统的青帮流氓，乘敞篷载重汽车，从海光寺兵营出发，由日租界窜出，沿途鸣枪，直到东马路，市面顿时紧张，毗连日租界地区多被骚扰。直接参加策划者，有曾任鲁军军长的李际春、曾任北京警察总监的张璧、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处长的白坚武和曾任直隶省财政厅长的郝鹏等。便衣队的人员都是南市一带的流氓和无业游民，由袁文会指使其表兄宋宝善，伙同郭小波、国文瑞、齐国富、王恩贵、周

孟楼等，把参加便衣队的人召集到日本租界芙蓉街（现河北路）万国公寓，每人发给四角钱和毒品白面一包、自来得手枪一支（这些手枪，都是日本总领事馆指挥在英租界开设的池田洋行运来的），就在这紧张混乱中，土肥原贤二变了一出拙劣的戏法，把在日本租界豢养7年的溥仪鬼鬼祟祟地劫持到营口，翌年在伪满洲国充当了傀儡皇帝（时称执政）。

土肥原贤二在天津日租界策划的便衣队骚乱，由日本驻屯军参谋课指导，共计两次。第一次是在1931年11月7日把溥仪劫走；第二次是1933年5月20日，企图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赶走。这两次便衣队骚乱，都由海光寺兵营派出大批日军用机关枪和铁甲车掩护，从万德庄、南市、东南城角，分三路进攻市区，都被中国军警击退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肃亲王的女儿金壁辉（日本姓名为川岛芳子）从伪满洲国跑到天津，住在日本租界东兴楼饭庄（时饭庄歇业）。川岛芳子和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关系密切，她的左右对外扬言多田骏是她的义父，故在日本人方面说话很有分量。有一次日本浪人走私，牵涉到华竹绸缎庄东家孙某，孙被日本宪兵队逮捕，华竹托日本警察署侦探长刘寿岩，通过川岛芳子，立即释放。因此一些败类走她的门路，除石友三、齐燮元外，尚有沧县一带巨匪刘佩臣，天津近郊几县土匪赵德谦、曹华扬和小站土匪李秀山、武清县土匪柳小五以及自称吴佩孚干儿子的刘鲲鹏。这些人经常靠拢川岛芳子，与日军司令部商量收编，他们招兵买马，组织所谓“自治军”。此后，日军司令部只要有人投效，无不接纳。例如：刘达生曾在直鲁军当过军佐，与华清池经理汪子良相识，每日在华清池五楼平台，带绿色遮光帽晒太阳，以脱帽后留下一道印箍，表示他当过军人。他假造数百人的花名册，伪称有一批军队，到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投效，请求收编，日军就给他几百元的联络费。这些土匪队伍，七七事变后都成了日本的皇协军。

1937年七七事变未发动前，天津驻屯军参谋茂川秀和（一般称茂川机关），用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的名义，邀请亲日分子高凌、刘玉书、孙润宇、钮传善、沈同午，在日本租界福岛街方若家中集会，预商在日军占领天津后出面维持地面治安，为日本效劳。不久天津沦陷，他们很快就组织了“天津治安维持会”，除上列5人外，又加入方若、王竹林、赵聘卿、王筱岩、邸玉堂，共计10人为该会委员。成立后的第二天，由茂川秀和引到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，晋谒司令官香月清司请训。

日军在天津日租界逐步扩大其所辖军队。庚子之变后经八国联军指挥官共同议定，日本驻军不得超过2000人，其保护北京使馆人数应为400人。嗣后日本政府藉口强化驻屯军，陆续增至8000人以上，驻在地点亦

超越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，扩展到通县、丰台、古北口、喜峰口等战略要地，成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人民的附骨之疽。先后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有新井龟太郎、小泉六一、高口丰树、植田谦吉、梅津美治郎、香椎浩平、多田骏、下村定、田代皖一郎和香月清司。植田谦吉和梅津美治郎曾先后任关东军司令官，植田就是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同十九路军作战的日酋。下村定任满后升为陆军省次官，代田皖一郎暴死于天津任内，香月清司是最后一任驻屯军司令官。这些天津驻屯军司令官，任满后调回本国，照例加官晋级，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首要分子。

经济上的压榨

日本设立租界初期，仅有海河沿岸往西到海光寺日本兵营的一条马路，芦庄子一带也只有20多户居民，其余皆是空地。日本来津经商的人很少，只有一些经营药品杂货之类的侨民，在天津城厢附近开设商店，有的在商店里住着家眷，当时天津市民叫这种商店为“鬼子铺”。东门脸有一家升恒药房，门前还有天津名书家顾叔度写的楹联：“晓日扶桑迎秦暖；春风潇洒识韩康”。东门里有楠德义药房，针市街有广济堂药房。这些药房初以汉药为主，营业品种中还有双美人香粉、狮子牌牙粉、仁丹、中将汤等，因而他们的足迹，伸入到偏僻的西头驴市口、大伙巷一带。

日本租界几经规划，所有马路两旁的临街铺面楼房，均由日本建物株式会社承修建筑。商业区的分布情况大致是东面沿海河至旭街（现和平路）及寿街等地系批发商店、洋行、公司、仓库等；门市部的商店洋行，多设在旭街北面。日资朝鲜银行、天津银行也设在日租界内。日本租界的行政机构和居民区则集中到旭街以西。日本洋行制度不同于欧美洋行，欧美洋行设有华账房买办，可以垫款为洋行买卖货物，华账房买办在其中赚佣金；日本洋行在原则上不设买办或华账房（正金银行除外），一般都由日本人直接掌握，而这些日本人，大多数是欧美留学生，精通国际贸易，对中国金融商情十分了解，故采取雇佣中国职员为他们服务的办法。一般雇员多是由考取或介绍来的，薪金至多不超过百元，但跑街请客应酬，或出外购货、接洽业务等费用，可实报实销。日本洋行对买卖成交不出佣金，但许可雇员在买卖成交中向中国客商索取佣金，一般不超过成交额的百分之一。有一些小的日本洋行，由于资金薄弱，为了多拉生意，也对雇员出点佣金，但其例甚少。

日本洋行可分为三类：一是物产株式会社，加上“物产”两字是表示营业范围很广，什么货物都可以买卖，例如三井、三菱、大仓等等；一是

不加“物产”两字，只单纯经营一种商品，例如加藤洋行是加藤本人独资经营的；还有一种是两合公司，就是有限公司与无限公司合并起来经营的。不管他们经营方式是怎样的，都是收购中国土特产、原料，运往外国，再把工业成品运来中国倾销。有些物产日本国内并不需要，也在中国大量搜购。例如他们不需要长尺寸的猪鬃和蛋黄蛋白，也大量收买转往欧美销售谋利。

天津是华北最大商埠，陆海交通四通八达，贸易范围包括河北全省及内外蒙古，西达山西、陕西、新疆，南至河南、山东等省，商业极为发达。日本商人以天津的日租界为据点，施展掠夺伎俩，如三井、三菱、大仓和武斋洋行等，都在天津做进出口贸易，朝鲜银行、横滨正金银行还在天津发行钞票，天津银行、正隆银行亦设在天津。他们将各种工业品、医药卫生器材、文教纸张用品以及罐头食品等大量输入，从租界转入中国内地销售。

日本在天津的进口货物，以洋布棉纱居第一位，并逐渐超越了英国。日商经营纱布以三井洋行为最著名，其品种有九龙粗布、蟠桃粗布和双鱼牌、日鸟牌、五子牌棉纱。其他如日信洋行、伊藤洋行、江商洋行等也大量经营这种业务。中国商人经营纱布行业者，多在北门外估衣街、针市街、竹竿巷一带，最大的商号有隆顺、隆聚、瑞兴义、同益兴、万德成、元兴隆、敦庆隆等，也都承销日本纱布，转销于河北省饶阳、高阳、香河、宝坻、保定、玉田等地，这些地区手工业所织的土布（布面一尺宽）均被排斥。例如高阳土布，在日本洋布未倾销前，是河北省农民的主要衣料；倾销后，手工业工厂纷纷倒闭，勉强支持的则转移方向，大部分销售到内外蒙古和西北边陲。日商针对这种情况，也把他的色布、粗布以同等价格，倾销到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和新疆的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处。天津的出口货物，以棉花居于首位。日商在向中国倾销洋布、棉纱的同时，还大量收购中国的棉花。日商洋行多设在海河沿岸，欧美洋行购棉花出口，以电报往返需时较多，而日本距天津较近，电报往返比较便利，因此天津货栈业的棉花商人，均每日集中到日本洋行听取行情。中国内地棉商运售的棉花，以西河棉花为主，绒头粗、弹力大、色泽洁白，用于衣被和纺织呢绒的原料最合标准，故西河棉花大部分落于日商之手。日商在津收购棉花以三井、东棉、三昌、山积、日信、松本、正华等数十家洋行为最，他们挟其雄厚资本，操纵了市场价格，连欧美洋行收购中国棉花，都要以日本洋行的行情为依据。

天津日本租界，曾有一个“商工会”，是研究怎样对付中国棉花商人的机构，会头是岗本。当初天津并没有商品出口的检验过程，为了追求高